

# 对侵略理论的深刻剖析

## ——评《东亚联盟论研究》

雷 颐

“狼吃小羊”是大家从小就熟知的故事。连狼要吃羊也一定要找出个“理由”，那么在人类现在的文明世界，当一个国家对外大举扩张时，仅恃武力自然远远不够，更要“理由充分”，更需要一套强大、系统的理论为自己的穷兵黩武提供“背景支持”，作为对外宣传的根据、对内煽动民情或曰动员民众的力量。日本从明治维新起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，从侵占朝鲜、中国台湾和东北，最终发展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。与此相应，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日本也发展出了一套相当“深厚”的侵略理论。的确，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，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，因而也难以持久、更难不断扩大。而且时至今日，日本朝野相当一些人对自己当年的对外侵略仍缺乏应有的认识，更谈不上深刻反省、忏悔，依然与这套理论大有关系。因此，对这套能如此蛊惑人心的复杂理论作番认真清理，当大有意义。对此，史桂芳著《东亚联盟论研究》一书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，使人颇受启发。

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，随着对外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，走上对外侵略、对内专制的军国主义道路，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种种支持侵略和专制的理论。首先出现的是“脱亚论”。这种理认为日本只

---

史桂芳：《东亚联盟论研究》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。本文引文均引自该书，不一一注明。

有学习西方“脱离亚洲”才能强盛,就国内改革而言,“脱亚论”当有进步意义。但是,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,“脱亚论”立即成为支持对外侵略的种族主义理论。有人提出“现在随着我日本帝国之开化进步,已经超过了顽愚的支那,凌驾于固陋的朝鲜,不仅如此,这也是我国藐视支鲜两国,自诩为东洋霸主的资本”。连日本颇具影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朝鲜、中国还未“开化”,即将为欧美所亡,所以日本“不可再犹豫踌躇、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,毋宁应脱离其行列,去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。我国对待支那、朝鲜之法,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,只有按照西方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。”这种理论成为明治政府制定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依据。但这种公开主张弱肉强食的侵略理论毕竟过于“赤裸裸”,缺乏欺骗性,所以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,日本的侵略理论又从“脱亚”变为“归亚”。所谓“归亚”,即是说日本与亚洲由其是东亚诸国“同文同种”,要实行“亚洲的门罗主义”,由日本充当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和保护人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‘脱亚’与‘归亚’,表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,其实本质是一样的,都是为了实现日本对亚洲的霸权。‘归亚’是‘脱亚’的发展,毋宁说,它比‘脱亚’更具有欺骗性。”

概括地说,所谓“归亚”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、种族主义诉求,它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,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“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”,“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,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”,“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,不得不进入大陆,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”。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已无力保护自己,所以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,宣传“是日本长期以来以自己独自的力量,反抗着欧美帝国主义对东亚的压迫,正因为有了日本,才避免东亚完全成为欧美的殖民地”。

这样,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是被白人误导,反成了欧美和苏联“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”,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,“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,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,是非常危险的”,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。因此,“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”,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。这种理论还十分狡猾地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,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,“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,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,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,榨取、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”,“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,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,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,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”。“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”,日本的经济政策是“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”;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“经济一体”,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。同时,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“文化殖民”,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。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,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,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。在不远的将来,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,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。现在,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,是王道的化身,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,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,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,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、拯救全人类,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。总之,这是日本为建立“王道乐土”而进行的“圣战”。

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动员日本国民心甘情愿地为侵略扩张牺牲,是日本侵略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,内阁在1937年8月24日通过《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》,要求国民“增强举国一致,尽忠报国的精神,无论事态如何发展,战

争如何长期,都要靠坚忍持久克服困难,达到所期之目的”。不久,在内阁组织下,成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,由海军大将马橘任会长,并在全道的、府、县成立相应的组织,由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会长,对精神、思想的控制和灌输制度化、系统化,因此更加有效、更加严密。这种“精神总动员”的实质就是完全否定个人、否定“私”。文部省在《臣民之道》中明确要求国民彻底否定“私”,一切都归于天皇,“我们平常的生活虽是私生活,但是这终究是在实践臣民之道。翼赞天业的臣民,其工作具有公的意义。进而言之,绝不能认为私生活与国家无关,属于自己自由而恣意妄为。虽是我们的一碗饭、一件衣服也不仅是自己的事情,即使我们游戏、睡觉也与国家须臾不分,与国家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,我们的私生活一刻也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”。在这种理论框架中,个人、私人的任何方面都完全消失,完全融入皇国之中。有关部门制定的《报纸等刊载限制事项》要求重点宣传“我国是东亚的轴心国家,而其他国家是卫星国家,只有依靠我国的领导或培养才能获得发展”。

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,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,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“魅力”,使当时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,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“圣战”,愿意为之奉献、牺牲自己的一切,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。

而且,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、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经济和文化殖民及“东方文化优越论”、“东方文化复兴论”等,很难说不对,因此这种理论具有更强的迷惑性,使人更难认清它的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。而这些冠冕堂皇的“反殖”“反帝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、更凶残的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所利用。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,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。事实说明,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

的、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,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,而仅仅作一种“纯文本”阐释,即从理论到理论,从概念到概念,从文本到文本,以“后理论”证“前理论”,以“新概念”证“旧概念”,以今天的“文本”对过去的“文本”进行一种“纯文本”阐释,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,那么,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“后殖民”、“反对跨国资本”、“反全球化”、东方文化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等各种理论来论证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“大东亚圣战”的合理性和正义性。同时,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“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”的结论!所以,对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的“纯文本”阐释方法,一定要非常慎重。

总之,《东亚联盟论研究》不仅对日本的侵略理论作了非常细致深入的剖析,而且通过这种剖析给人一种方法论意义的启发,即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“纯文本”分析疏理,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、甚至危险的结论。因此,对各种“话语”,万勿仅据其“自我表白”便轻作判断,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,关键在于要洞察它是由谁掌握、针对什么、又是如何被运用的。

(作者雷颐,1956年生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荣维木)